

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一年诸暨县革命斗争史大事记（初稿）

“五四”运动爆发后，杭州学生运动也群起响应，其时亡中华、张秋人、边思明、寿松涛……等同志，都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积极参加爱国反日运动，亡中华同志选为杭州市学生会理事长，一九二〇年夏亡中华同志毕业后，即被聘为本校附小教师。

一九二一年春，陈师望、亡中华同志赴沪，任马克思研究会干事，不久旋赴苏联学习，在苏逗留四月余，一九二二年回国后，至为肖山沈玄卢所邀，至肖山乡村任教师并组织农民运动，下半年农会成立，较大村庄，均开办学校，中华同志并为《责任》周刊撰稿，其中一篇题为《杀亡统》之论文，被浙政府追查。后《责任》周刊查封，撰稿人徐白民遭拘捕，拘禁一月后，驱逐出埠。

一九二三年中华同志代表浙江出席广州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府。中华返浙后，即指导各县成立党下，吸收新党员，发展党的组织，在中华领导下，诸暨也于一九二三年成立县党下，由钟子逸负责，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后因肖山玄卢变节，与西山会议派肮脏一起，中华同志为痛恨，毅然离肖，另邀先进者至海宁硖石商讨对策，继续主持浙江省党务工作，一九二四年即率领浙江省各县党组织与西山会议派展开斗争，并经常与上海地下党联系，取得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同年秋，即批准中华同志为正式党员。

一九二五年北洋军伐孙传芳下入浙，党员大下被迫转入秘密活动，中华移居上海，仍主持浙江省党务工作，时而赴浙指导各县党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革命军向江西、湖北挺进，中华同志赴南昌与蒋介石白洽，商定浙江省政府人事问题。

一九二六年初冬，浙江省警文厅长夏超为响应北伐率下起义，起

义遭失败后，中华与张秋人、毛泽民等同志离杭赴诸暨牌头地区指导党和农民协会工作，声讨北洋军伐孙传芳、作迎接北伐军的组织准备。

1926年冬，北伐军先头师队抵浙赣边，中华率代表团绕道温州前往迎接，后随军由金华、兰溪而下，一路号召指导各县党下、组织发动农民协会，配合北伐军作战，1927年春节期间，诸暨牌头区、草塔区，下北区等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全下以土枪土炮配合北伐军周凤祺，迅速击溃孙传芳下，肃清其散兵沈勇，并缴获下份洋枪、子弹，武装了农民。

1927年春北洋军伐孙传芳、周阴仁等下被全下肃清后，浙江省党下即正式公开，中华被选为浙江省党下主任委员，积极指导各县党下活动，贯彻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诸暨党公开后，由钟子逸负责，主要党的骨干有：
继续发下工农群众组织，下传推行二五减租等。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蒋系浙江反革命分子，先在杭州等地发动叛变，所有新成立的党政机构，全下被摧毁，进步人士继续被扑入狱，中华亦被南京反动政府所通缉，中华先在华挺生同志掩护下，在杭荫蔽十余日，又在薛薯桥同志帮助下，化装抵沪，不料被密探跟踪，到上海龙华车站被捕，后牺牲于龙华伪警备司令下，从此反浙江、诸暨等公开活动的党员，均遭反革命武装——省防军、密探经常跟踪追捕，迫得这些党员无法立足。

1927年中华牺牲后，组成新的省委，张秋人同志任省委书记，下侠武同志为诸暨县委书记，1927年8月在滴水岩（马村附近）召开一次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四、一二”事变后党的组织活动和群众工作。

1928年2月在金村金如旺同志家召开一次党代表会，由如旺

同志主持，到会代表近百人，入夜会议将开始，发现可疑情况即散会。这次会议决定由陈兆龙为县委书记，并推选骆子贞为代表，出席中央劳工会议（一次出席中央六届代表大会），骆到上海，即遭被捕。

1929年到1930年反革命武装——省防军，镇压革命，追捕共产党人，已到了自热化的程度，党的领导人常被被捕，因此县委负责人更动较多，先由张以民负责，不数月，又改由陈水涛负责。成员有郭大善、寿菊生。

1930年初夏，正值诸暨农村粮荒，粮价飞涨，省委书记蓝芳同志亲自到诸暨并深入到下北、金村、里坞等支下，下署发动农民，执行立三路线，盲目无计划的实行武装暴动，暴动很快遭到失败，党组织被摧毁，党员和革命群众大批遭屠杀。从此诸暨革命人民又在生活在三座大山压力下，痛苦和悲愤交集。

1936年12月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帅、聂荣臻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迫使杀人魔王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各项主张、和平解放西安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在南京设了办事处，朱同志要徐洁生同志去南京办事处联系。徐去后由络甫同志接谈，当即组成浙江省临工委，徐为书记，张宗文组织，张之扬任宣传，赴浙进行重建党的工作，杭州沦陷后，临委移往金华。

与此同时上海党派马行健、王志强，临工委派骆子贞，长江局派扬思一，回诸暨开展抗日活动和重建党的工作，1938年春，东南局和省临工委派顾王良同志（？）来诸暨整顿和统一党的组织，以马行健为临工委书记，领导成员有扬思一、王志强、寿景山等同

志，1938年五月在枫桥新店湾召开了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到会与近50人，为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群众运动，把抗日自卫委员会作为我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机关。把各区战时政治工作队作为我党发动抗日群众运动的组织力量，从此抗日农民协会、妇女会、读书会、抗日义勇队后改为土枪队蓬勃发已遍及各乡，1938年6月建立新的县委，由杨思一任书记成员由马行健、王志强、寿文魁。

1938年10月，日寇攻占武汉长沙后，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政治诱降，驻钱江南岸的日寇也曾一度攻占肖山到诸暨县埭，不数日退回钱江边作为向国民党反共投降派诱降的手段。

从此反共投降之声，日益嚣张。1938年十月下旬，为了打击汉奸投降派的活动，党通过抗日自卫委员会，团结县长邓初，县国民党书记长付文象，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宏来诸暨、肖山前线视定之际，在牛市召开一次抗日肃奸大会，参加大会的全系来自各乡全付武装的土枪队员，近三万人，秩序井然，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闻之丧胆，盛传日本人怕诸暨之谣。

浙江反共头子亡铁吾、周波浪之类，立即勾结诸暨豪绅地主，组成暗杀团，他们先暗杀国民党县党下书记长付文象，驱逐县长邓初，继则在江东桥上暗杀县民教馆长共产党员黄旭初，1939年春又在金华绑架暗杀赴省请领代表诸暨抗日专年领袖王静安同志。

1939年4月1日周总理在枫桥大庙参加抗日群众大会，并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1939年9月在里坞底琢成小学召开党的全县代表大会，到会代表近30人，历时五夜，根据新形势下党中央、省委指示和周

总理的教导，继续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巩固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会上选出新的中心县委成员：张光、寿文魁、沈均良、杨沅时、何芝湘五人。1940年12月县委宣传部长沈均良脱党自首叛变。

1941年2月，朱学勉、叶柏善、叶瑞康同志从余姚调诸暨工作，张光调余姚，寿文魁调乘县工作，党转入单线领导。